

從私權威觀點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發展

林竣達

馬里蘭大學政府與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試圖深入分析私權威的概念，並評析近期學界對於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念能對全球治理研究提供兩項重要貢獻：首先，私權威的概念挑戰了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傳統觀點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途徑。其次，私權威的概念有助於研究者以行為者導向的途徑來解釋全球治理中的變異現象。以私權威的概念作為基礎，本文梳理了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發展情勢，並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作為關鍵個案，評析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三個研究方向：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自願性全球標準在形式上的變異，以及自願性全球標準的成效。本文最後在結論中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全球化、全球治理、私權威、自願性全球標準、非國家行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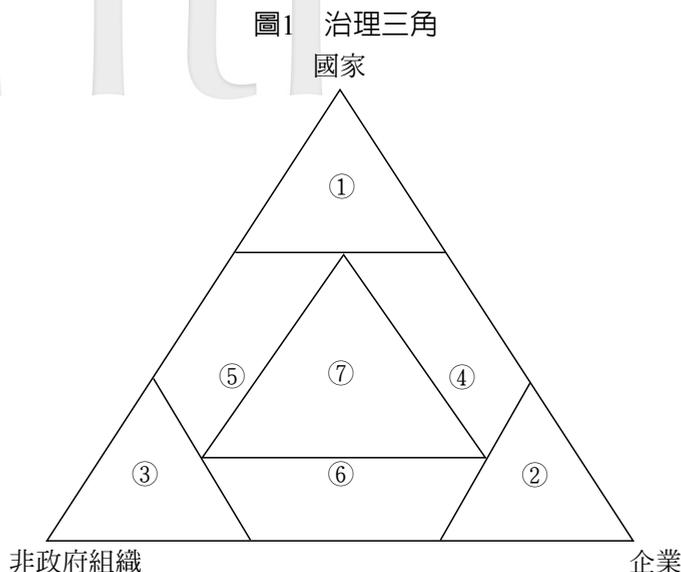
* * *

壹、前言

美蘇冷戰結束後，人們開始渴求新的知識框架來理解趨於複雜的全球化現象，以及因應一些新興的全球議題。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對現實主義及自由制度主義等主流理論也感到不滿，開始尋求新的途徑來理解世界的變化，並探問新的研究問題（Hewson and Sinclair 1999; Weiss 2000）。自Rosenau和Czempiel所編的重要著作《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於1992年問世後，「全球治理」的概念開始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普及起來，並挑戰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方式。同年，瑞典政府發起了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並於1995年發佈了《Our Global Neighborhood》，而聯合國系統也於1995年創辦了學術刊物《Global Governance》。基於上述這些脈絡，「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反映了當時人們面對世界複雜化的恐懼與希望，並在1990年代開始被大量使用及傳播。

受到歐美學界的影響，國內政治學界對於全球治理的研究也開始增加。在國內的政治學研究中，全球治理的概念已被用來描述下列各種現象，諸如：國家不再是唯一的權威來源；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興起；多層次及跨國治理網絡的出現等（宋學文 2003；辛翠玲 2019；郁瑞麟、周繼祥 2015；袁鶴齡、沈燦宏 2012；袁鶴齡 2003；張亞中 2001；張雅君 2008；彭慧鸞 2004；楊惟任 2015；曹俊漢 2013）。然而，多數研究雖都提及了非國家行為者的興起，但大多的分析仍著重在以國家為主的條約、國際組織、跨國政府間組織，以及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非國家行為者僅被視為這些既有治理體制下的新興參與者，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制定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則較少被談及。就自願性全球標準來說，非國家行為者成為主要的治理者，國家及國際組織僅為輔助角色，但國內對此研究卻較為不足¹。以Abbott and Snidal（2009）所發展的治理三角（Governance Triangle）來看（圖1），目前國內全球治理的經驗研究大多聚集於1、4、5和7的區塊，但對於自願性全球標準所坐落的2、3、6等區塊，便較少相關經驗研究。

¹ 目前國內已有的研究為顏良恭、謝儲鍵（2015）。



資料來源：Abbott and Snidal（2009）。

此外，多數研究僅描述了全球治理的現象，但並未對其全球治理中的變異（variation）作出解釋。在部分試圖提出解釋的研究中，國內學者多以結構性的因素來解釋全球治理的興起。具體而言，這些結構性因素包括了經濟的私有化及去管制化、全球新議題的出現（如全球暖化和恐怖主義）、新通訊技術的發明、公民在知識上的提升、跨國生產網絡的形成、全球金融市場的擴張、新自由主義的流行、冷戰的結束等（Braithwaite and Drahos 2000; Cerny 1995; Djelic and Sahlin-Andersson 2006; Mayer and Gereffi 2010; Rosenau 1990）。由於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傳統治理模式，並無法因應上述結構性轉變所帶來的治理難題，因此出現了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然而，結構性的解釋雖能夠指出全球治理興起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並無法解釋全球治理的許多變異。例如，結構性的解釋並無法說明為何非國家行者在某些時候能建立自願性標準，有時候卻無法建立標準。此外，目前全球治理的形式日趨複雜（圖1），除了傳統政府間合作，還包括了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以及私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合作，結構性解釋並不能進一步解釋為何全球治理會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及結果。

有鑒於上述問題，本文首先將梳理「私權威」的概念及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現象，以此增進中文文獻對全球治理複雜性的理解。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念不但挑戰了國際關係理論中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也否定了權威只能來自於國家的假設。更重要的是，私權威的概念說明了私部門的權威來源為何，這有助於我們去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變異及效果。其次，爲了提升全球治理研究對現象的解釋能力，本文將介紹以私權威概念爲基礎的全球治理理論。其中，本文將著重於俱樂部理論以及供給需求理論，這兩個理論都屬於行爲者導向的途徑（actor-oriented approach），亦即從行爲者的策略及互動關係，來解釋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及變異。然而，儘管這兩個理論能夠補足結構性解釋的不足，本文認為其仍存在許多理論上的侷限。最後，本文將評析目前關於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經驗研究，整理出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治理成效的幾項關鍵因素，包括自願性標準的制度設計、全球供應鏈、外在社會壓力、自願性全球標準之間的競爭，以及各國國內制度及政策的作用。

本文將分爲以下二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將透過對概念及現象的整理，建立「私權威」的觀點。本文將先梳理「全球治理」以及「權威」的概念，並以此爲基礎來闡述「私權威」的概念。以私權威的概念爲基礎，本文將以自願性全球標準爲例，說明私權威在全球的發展現象。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探討「私權威」的觀點已對理論及經驗研究產生哪些貢獻。本文選擇三項研究議題來闡述私權威的研究進展，這三大重要議題包括：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式爲何出現變異？在哪些條件下，自願性全球標準能產生較好的成效？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說明目前的理論途徑及研究成果，並指出現有研究的侷限，本文也將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作爲關鍵個案，更具體地闡述本文對既有理論及研究途徑的反思。最後，本文將在結論中爲未來研究提供一些建議。

貳、私權威的觀點

一、全球治理與權威

在目前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意義，也因此會被學者視作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Hofferberth 2015），或被批評者認為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模糊概念（Finkelstein 1995）。爲了能更精確地使用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學者試圖梳理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在學術上的使用脈絡。根據Dingwerth與Pattberg（2006）的分類，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在學術上通常可以區分出分析性的（analytical）及規範性的（normative）用法²。本文認為，全球治理的不同用法，反映了這個概念的豐富性。只要研究者能在使用時謹慎且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用法，全球治理概念的多元性並不必然會成爲問題。對本文而言，全球治理的分析性用法爲主要的焦點。

本文將「治理」定義爲特定行爲者對有限的群體行使權威（Kahler and Lake 2003; Lake 2010）。治理（governance）並不同於政府（government），因爲其他社會及政治組織也有可能對有限的群體行使權威，民族國家只是能進行治理的行爲者之一。在此定義下，「全球治理」可以進一步定義爲特定行爲者行使跨國界的權威，這裡所指的特定行爲者可以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Lake 2010）。換言之，相較於其他較廣義

² 全球治理的第一種用法是將全球治理視爲分析性的概念，用以解釋可觀察的現象。學者使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主要是在挑戰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透過全球治理的概念，學者可以將非國家行爲者以及多層次的治理行爲納入分析視野，而不再是僅關注於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對於著重分析性的全球治理研究者來說，解釋政治活動如何在不同層次之間互動；新形態權威爲何興起、如何運作並產生何種結果；以及全球治理如何發生變遷，都成爲值得研究的新主題（Barnett and Duvall 2004; Weiss and Wilkinson 2014）。全球治理的第二種用法是將全球治理視爲規範性的概念，並用此概念來分析社會應該如何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興問題，以及國家角色的變遷。例如 Held（1995）認爲現今跨國經濟活動已弱化了各國民主制度，因此應該透過全球治理來管制全球市場。又或者如Zürn（2018）認爲全球治理的目的在於提供全球公共財。不同於上述學者對全球治理持正面態度的觀點，另一些學者則是批判性地審視全球治理的概念，並認爲全球治理其實是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論述（Friedrichs 2009; Overbeek 2005）。

的定義³，本文的「全球治理」在指涉的現象範圍上較為有限，僅著重於涉及權威的社會關係。在下一節中，本文將近一步界定權威的內涵。

二、權威的概念

在討論私權威的觀點之前，本文首先必須釐清權威（authority）這個概念。權威可被視作爲一種特殊的權力類型，這種權力類型不是來自於強制（coercion），而是建立在被治者認可或同意的基礎之上，如學者Lake所言：「權威不是來自於統治者的宣稱，而是被治者授予的權利」（Lake 2009），權威來自於治理者跟被治者之間的社會契約（Lake 2009; 2010）。權威與權力（power）在概念上不完全重疊，權力的概念比權威更廣。權力有時可以指涉行爲者所具備的某項能力（capacity）或特質（attribute），但權威這個概念必定包含了行爲者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Hall and Biersteker 2002），以及正當化的過程（Finnemore 2014）。換言之，權威的概念結合了正當性（legitimacy）與權力這兩概念（Hall and Biersteker 2002; Hurd 1999）。被治者認可或同意治理者的行動具有正當性，從而在行爲上依循治理者的意志及判斷，治理者才因此具有權威。也因爲被治者的同意，治理者得以享有正當的權利，可對違反社群規則的人進行懲罰（Lake 2010）。

進而言之，權威可以被定義爲一種透過誘導及說服來讓他人服從的能力（Avant et al. 2010）。權威並不是透過強制或恐懼來迫使被治者做他們本來不願做的事，而是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事，並說服他們去做這件對的事（Barnett and Finnemore 2004）。權威不需要使用強制，被治者必須自己感覺到有義務

³ 例如Rosenau（1995）將「全球治理」定義爲在人類活動所有層次中的規則系統，這些規則系統在透過控制以追求目標時，會產生跨國性的影響；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將「治理」定義爲：「治理是各種個人的與機構的，公共的與私人的，在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合作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與機制，同時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爲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又或者如學者Weiss和Wilkinson（2014）將「全球治理」定義爲：「正式或非正式的觀念、價值、規範、程序及制度的總和，它能幫助所有行爲者（包括國家、國際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及跨國公司）辨認、了解並解決跨國界問題」。

服從治理者的意志，治理者才算擁有權威。治理者之所以能得到被治者的認可及信任，可以來自許多原因，例如學者Avant, Finnemore和Sell（2010）便將權威的來源區分出五種類型（表1）。更重要的是，治理者的權威是處於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治理者的權威有可能受到內外因素影響而產生變化，例如治理者自身內部可能擁有多種類型的權威，不同類型的權威可能可以相互支持，但也可能會在某些條件下發生衝突。又或者在某些議題領域中開始出現多個治理者，他們彼此之間可能會出現合作或衝突，從而增強或弱化他們的權威。綜言之，治理者可以透過許多方式來得到被治者的認可及信任，進而建立起權威。然而，在時間點A中享有權威的治理者，不一定也能在時間點B中也享有權威。

表1 權威的五種類型

權威類型	內涵
制度型權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已建立的組織結構，並受限於組織的規則及目的
授權型權威（Delegat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其他權威者的授權
專業型權威（Expert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專業知識
原則型權威（Principl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廣為接受的原則、道德及價值
能力型權威（Capacity-bas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行為者勝任的表現

資料來源：Avant, Finnemore and Sell（2010）。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常認為，由於國際體系中並不存在全球政府，因此權威也不存在國際體系之中。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為例，國際體系的本質被假定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在此無政府狀態下追求自我利益，試圖競求權力以圖安全⁴。然而，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並不足以幫助我們解釋一些國家

⁴ 對結構現實主義來說，其主要關注的分析單位為體系（system）或結構（structure），並認為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數量和其能力分佈，決定了體系的穩定程度（Waltz 1979）。然而，結構現實主義在使用權力的概念時，其內涵仍較偏向於能力（如自然資源、生產性力量和軍事力量）與強制（coercion），並不強調正當性的重要

行爲。例如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太過重視以強制爲主的權力概念，但如果只重視強制，我們便難以在經驗上解釋爲何一些國家即便缺乏嚇阻實力，仍然能夠維持主權及疆界的穩定（Hurd 1999）。相反地，透過權威的概念，主權可以被理解爲是被國家廣泛接受，因而具有正當性的國際原則，主權的原則因此成爲權威的來源，多數國家皆自願地遵循這項原則，而不會輕易地變更既有的國家疆界。簡言之，權威的概念之所以開始被國際關係學者重視，是因為它有助我們解釋一些無政府狀態的假設所無法解釋的國家行爲。

三、私權威的概念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參與全球治理的非國家行爲者，不僅在數量上快速增加，其影響力也日益增強。非國家行爲者不但能夠創造規範性觀念及設定議題，更能建立標準，並且加以執行。然而，既有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並不足以幫助我們深入地理解這些新的全球政治行爲者⁵。對此，學界開始反思既有的權威概念，並透過建構私權威（private authority）的概念，來進一步解釋非國家行爲者是如何能在全球政治中成爲具有權威的治理者。

自由主義及民主理論在傳統上，常假定只有公領域的民主政府具有政治權威。民主政府因具有課責性，能回應民衆的需求，從而享有權威，私領域因不具有課責性，故無法產生政治權威⁶（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然

性。換言之，結構現實主義所談的結構雖然能夠決定行爲者間的互動模式，但在此結構下，行爲者擔憂的是權力失去平衡後會危及自身的生存，而不是主動感覺到自己有義務去服從治理者的意志。

- 5 早期研究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學者雖已強調過非國家行爲者的重要性（Keohane and Nye 1971），但後來的建制研究仍然走向以國家爲中心的方向（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國際關係學界雖有一些針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但並非主流，相關研究可參見Stopford et al.（1991）、Eden and Potter（1993）、Strange（1996）、Murphy（1994）。
- 6 自由主義常假定私領域主要涉及個人及自由市場間的經濟交換，而公領域則涉及國家權威及合法的強制（Hall and Biersteker 2002）。從觀念的歷史發展來看，公私領域的二分法主要能鞏固主權國家與其他非國家行爲者之間的疆界，並有助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然而，公私領域的簡單二分已不足以反映資本主義全球發展下的一些現象：首先，一些政府及政策的運作方式開始接近私領域的商業行爲，政府官員與企業之間也存在緊密的聯盟關係；再者，私領域的跨國企業或商業團體有時能發揮類似政府的

而，從上節關於權威概念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知道，權威其實不一定只能來自於公領域的政府，私領域的非國家行為者也可以透過授權、專業能力、或優異的表現來獲得權威，而這種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權威可被視作私權威。此外，非國家行為者可以透過公開的過程來建立私權威，也能因此產生課責性，不一定只得依靠政府制度，才能產生課責性。更重要的是，基於上節的討論，權威其實能在全球層次中發揮作用，這也意味著，私權威同樣也能形成於全球層次中，並在全球層次發揮作用。簡言之，基於本文所界定的權威概念，權威其實並非只能形成於公領域或國內層次之中，私部門的行為者可以透過受治者公開的同意或社會認可而成為私權威，並成為國家之外的全球治理參與者。

私權威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例如學者Hall and Biersteker (2002) 將私權威區分出市場權威 (market authority)、道德權威 (moral authority) 以及非法權威 (illicit authority) 三大類。值得注意的是，非法權威的存在，意味著有些私權威雖違反國內法或國際法 (如跨國犯罪組織及僱傭兵)，但他們仍能取得被治者的認可，並且有效地在一些動盪地區提供國家所無法提供的公共財。簡言之，有些私權威來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倫理道德或宗教信仰，但有些私權威則可能不符合主流的道德價值或法律。

私權威也涉及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倡議、研究出版、制定標準、提供社會福利、契約擔保，維持安全秩序等 (Hall and Biersteker 2002)。本文以下將著重於標準制定這項活動，在此範疇中，私權威可被定義為下述這種狀態：「非國家行為者制定了規則或標準，且這些規則或標準獲得世界政治中的其他相關行為者遵循」 (Green 2013, 42)。換言之，私權威意味著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或標準，必須被受治者視為具有正當性的，而且這些受治者對這些制度或標準表現出高度的遵從 (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若受治者違反了這些由私權威制定的規則或標準，他們通常面臨的是來自社會或市場的懲罰，而非直接遭受國家法律的制裁 (Vogel 2010)。

功能，或直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 (Cutler 1997)。私權威概念的出現，便是試圖指出傳統公私二分法的不足，並主張私領域的非國家行為者也有可能擁有權威。私權威的概念雖未完全揚棄公私二分的假定，但仍可作為描述公私二分趨向含糊混合的概念工具之一。

更具體而言，在學者Green（2013）的定義中，非國家行為者可以包含非政府組織、私人企業、專家、跨國企業、協會、基金會，以及跨國倡議網絡，但國際的政府間組織並不包含在內。此外，Green並未將非國家行為者的所有行為都視作私權威，而是專注於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及標準。再者，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及標準並不一定要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也可以是被治者自願性地遵從。最後，私權威所影響的被治者範圍可以很廣，包括了世界政治中的相關行為者，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都可以被納入其中。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私權威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非國家行為者必須設法透過專業知識、價值理念或執行表現，來贏取被治者的認可，讓被治者相信其所制定的標準及規則具有正當性，非國家行為者才能獲得權威（Bernstein and Cashore 2007; Overdevest 2010）。在建立標準之初，參與者可能有限，非國家行為者必須設法擴大支持者，說服更多人加入。非國家行為者在成功地建立標準，並成為私權威後，仍可能會面臨各種挑戰，例如專家或政府官員可能會對標準提出質疑，私權威必須能有效地因應質疑。有時私權威必須與其他的權威者進行競爭，例如非國家行為者或國家可能會選擇建立另一套標準及規則，若競爭失敗，則原有的私權威可能會漸漸消失。

四、私權威與自願性全球標準

在全球治理的現象中，國家的部分權力開始轉移至國際建制並不算是新現象，但全球性私權威的出現可以算是真正的新現象⁷（Murphy 2000）。1906年時建立的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可以算是最早的全球性私權威，而後，於1946年建立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則更是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

⁷ 但亦有學者認為，私權威在歷史上並非新現象，早期私權威的例子包括中世紀的行會（guild），以及17世紀歐洲出現的商人習慣法（Lex Mercatoria or Law Merchant）（Green 2013; Vogel 2010）。此外，18、19世紀的英國棉花產業除了積極地組織商會，試圖制定規則去影響產業之外，更積極地去影響政策，試圖透過大英帝國的力量，來削弱國際競爭對手（Porter 1999）。不過，這些早期的私權威尚未制定出自願性全球標準。

(Yates and Murphy 2019)。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為例，至2018年為止，已有307059筆認證遍佈於171個國家中 (<http://www.iso.org>)。全球性私權威所制定的自願性全球標準⁸，如今已出現在各行各業 (表2)，持續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 (按行業分)

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 (建立時間)
林業產品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1993)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1994)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1999)
服飾業	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Fair Labor Association (1996/99)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1997)
	Worldwide Responsible Apparel Production (2001)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CARE program (2002)

⁸ 目前學界已使用多個概念來描述全球性私權威的活動，諸如非國家市場驅動治理體系 (non-state market driven governance system)、私部門國際建制 (private international regime)、跨國私部門管制 (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私部門監管治理 (private regulatory governance)、私部門治理 (private governance)、私部門全球管制 (private global regulations)、跨國商業治理 (transnational business governance)、全球商業管制 (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以及全球公民管制 (global civil regulation)。上述概念在內涵上有所重疊，但各自側重的面向有些許不同。本文主要關注於私權威所制定的標準，這些標準通常被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自願性地遵循，且這些標準在實行範圍上超越單一國家，因此本文將使用「自願性全球標準」這個詞彙。本文著重的自願性全球標準主要是指由非國家行為者建立的全球性標準，不包含公部門所制定的強制性規定。換言之，自願性全球標準可被視為治理這個概念下的一個子集，治理的概念至少包含了由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作為治理者，而自願性全球標準屬於由非國家行為者作為治理者的範疇，從治理三角來看 (圖1)，主要會座落於區塊2、3與6。全球標準的「自願性」意味著，私權威並非透過強制的方式來讓被治者遵循全球標準，而是必須設法透過專業知識、價值理念或執行表現，來讓被治者認可其制定的標準，並願意主動遵循該標準。由於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快速興起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本文以下將著重探討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研究。但必須強調的是，建立自願性全球標準僅是全球性私權威可採取的行動選項之一，全球性私權威還能透過其他方式 (如遊說政府、研究出版及倡議等) 發揮影響力。本文主要聚焦於自願性全球標準，全球性私權威可採取的其他行動選項，則已超出本文能處理的範圍，另需專文處理。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按行業分）（續）

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時間）
漁業	Marine Aquarium Council（1998）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1999） Friend of the Sea（2006） 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2010）
電力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
旅遊	Green Globe Certification Standard for Sustainable Tourism（1999） Sustainable Tourism Stewardship Council（2003）
電子業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2004） EPEAT standards for electronics products（2005）
化學業	Responsible Care（1985）
農業 食品業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1972） Max Havelaar（1988） Rainforest Allianc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etwork（1993） Fairtrade Labeling Organization（1997） Ethical Tea Partnership（1997） Bird Friendly coffee certification（1999） Flower Label Program（1999） UTZ certified standar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2002）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2004） Bonsucro standard for sugar cane（2004） 4C Association code of conduct for coffee（2006）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Soy（2006） GLOBALG.A.P.（2007） Global Roundtable for Sustainable Beef（2010） Unileve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ode（2010）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按行業分）（續）

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時間）
能源 礦業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2003) Equitable Origin standard for petroleum (2005)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 (2006)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Biofuels (2007)
金融	Climate Bonds Standard (2010)
跨行業	SA8000 (1989)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2000)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2003) ISO 14001 (2006)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2010) SASB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 (20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其中，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可被視作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之一。在1980年代，面對全球森林砍伐日益嚴重的問題，跨政府組織國際熱帶木材組織（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不願建立全球性的管制，聯合國的經濟發展會議也未能通過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這情勢讓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木材貿易商、原住民組織、以及其他環境非政府組織決定自行建立自願性的全球標準（Humphreys 1996）。1993年，森林管理委員會成立，並建立了自願性標準。該標準包含了10項原則、56項指標，並且會透過工作小組依據各國及各區域的狀況進行調整。企業生產的商品必須經過獨立的第三方認證，才能夠貼上森林管理委員會的標籤。森林管理委員會在創立之初便標榜民主的內部參與程序，並建立了三個主要的委員會，分別代表來自環境、社會，以及經濟的參與者，三個委員會各自享有平等的投票權。在各委員會內部，會再區分出代表南方國家的委員會，以及代表北方國家的委員會（Cashore et al. 2007）。目前森

林管理委員會擁有1,168成員，分別來自90個國家，並已完成41,257筆認證，涵蓋的森林面積為2億公頃。

參、私權威的研究進展

一、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

(一) 俱樂部理論

在私權威的研究中，自願性全球標準興起的原因是最重要的研究問題之一。針對這個問題，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全球標準，能夠幫助企業降低協調彼此的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Porter 1999）。這樣功能性的解釋雖然可以說明企業的潛在誘因，但仍不足以解釋為何企業有時會選擇自願地加入私權威所建立的標準，有時候卻選擇不加入。此外，建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過程是需要花費成本的，參與者之中很有可能會出現搭便車者，造成參與者之間集體行動的困境，功能性的解釋並無法說明這樣的集體行動困境是如何被克服的（Büthe 2010）。為了解釋上述問題，學者引入了經濟學中俱樂部財（club good）的概念，以此建立理論來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Potoski and Prakash 2009）。

俱樂部理論（club theory）認為，企業之所以願意加入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是因為這些自願性標準能提供俱樂部財。俱樂部財具有排他性，僅有俱樂部的成員能享受到其效益，俱樂部財在成員之間不具有競爭性，俱樂部財不會因成員的增加而減少。自願性標準所產生的俱樂部財其實就像是一種品牌，加入的成員能因此品牌而享有較好的聲譽（reputation）。當企業加入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時，它能夠向利害相關者發送重要信號，將自己區別於那些未加入自願性標準的企業（Prakash and Potoski 2006b）。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有可能會產生對社會有害的外部性（externality）。這些外部性的成本，並未被納入產品的成本之中，也因而未被反映在產品的價格之上，這導致外部性常被過度生產，遠高於社會最佳數量。如果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能夠獲得外部性的資訊，他們便能夠選擇是否

繼續要購買這些產品。對一些消費者來說，他們可能選擇減少購買產生負面外部性的產品，或是轉而購買其他價格雖高但負面外部性較低的產品。

然而，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一般常缺乏資訊管道，來確認企業是否製造了對社會有負面效應的外部性。針對這個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企業雖然可以單方面地宣稱自己生產的產品不具有負面外部性，但這類的自我宣稱在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眼中，常不具有可信度，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難以驗證企業的自我宣稱是否為真。也因此，私權威成爲解決資訊不對稱的解方之一。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能爲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提供關於外部性的可靠資訊，降低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辨識良好企業的交易成本。有效的自願性標準也能確保加入的成員能夠遵循規則，降低成員企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從而使成員企業獲得較佳的社會聲譽。綜合上述，有效的自願性標準能爲企業和其利害相關者帶來雙贏局面。

依據以上邏輯，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之所以能夠興起並成功運作，是因爲這些自願性標準能夠有效地爲成員提供俱樂部財。更進一步說，這些自願性標準必須具備一些有效的制度設計，確保俱樂部財能夠被有效提供，並排除搭便車者的會員資格，才能夠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Potoski and Prakash 2009）。首先，自願性標準必須建立具體明確的標準，明定成員必須具有哪些條件、做出哪些行爲，或具有什麼樣的表現，才能夠成爲自願性標準的成員。同時，自願性標準也須爲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提供可信的查證機制。當自願性標準能夠成功地建立形象良好的品牌，才能夠吸引企業加入並留住成員。其次，自願性標準必須建立內部的監督及懲罰機制，來確保成員都能遵循俱樂部的標準，不讓搭便車的成員傷害自願性標準的聲譽。

環境治理中的ISO14001，常被視作可闡述俱樂部理論如何成功運作的經典例子。ISO14001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1995年時建立的標準，ISO爲一非政府組織。ISO14001要求參與標準的企業在內部建立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EMS），改善環境績效。例如該標準要求企業改良商品包裝的方式或優化商品設計，以達到減少污染以及節能減碳等目的。由於ISO14001已是具有國際聲譽的標準，企業加入該標準的好處之一，便是能夠

標榜自己為綠色企業，從而提升企業在市場上的聲譽。企業可自行選擇是否要加入ISO14001，但欲加入的企業必須付費通過第三方認證的程序。第三方認證機構會確認申請者提出的EMS是否符合ISO14001的要求，符合者才能獲得ISO14001的會員資格。透過第三方認證的程序，ISO14001得以確保未遵循ISO 14001的企業，無法取得會員資格。此外，參與會員必須每年定期進行重新認證，從而確保參與企業持續執行ISO 14001，而不是成為搭便車者。如俱樂部理論所闡述的邏輯，ISO14001透過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企業自願加入，並透過第三方認證的方式排除搭便車者，以便讓成員可以持續享有俱樂部財，從而使得ISO14001能長久存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二）俱樂部理論的限制

俱樂部理論雖然能幫助我們以行為者導向的途徑，來理解行為者如何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建立自願性全球標準，但該理論仍然存在著一些限制。首先，俱樂部理論過於依賴理性決策模型的假設。俱樂部理論假定行為者皆為理性（或有限理性）行為者，行為者能透過成本效益分析，來評估各種策略選項的後果，並從中選擇效益最大的選項，而這個決策過程會受到可得資訊的豐富程度所影響。換言之，俱樂部理論認為行為者主要是依據後果的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來行動。企業之所以願意加入自願性標準，是為了享受到自願性標準所建立的品牌聲譽。透過提升聲譽，企業可以降低遭受社會抗議的風險，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從而獲取較高的利潤（Dauvergne 2017; Fransen and Burgoon 2012; Marx 2008）。

俱樂部理論假定了企業的偏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自願性標準之所以能具有正當性，是因這些標準能夠提升效率，幫助企業達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然而，這種效益主義式的假定並無法解釋，為何在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仍然有企業願意遵循自願性標準（Bernstein and Cashore 2007）。俱樂部理論所忽略的是，行為者除了追求自利，亦有可能會依據特定價值觀念或認同來行動。當自願性標準普遍被社會或同儕視作為正當的原則時，行為者為了能被社群認可，便可能選擇遵循自願性標準。透過與社群其他成員的互動過程，行為者可能會將特定價值內化，形成穩定的認同。例如研究發現，當企業的資深經理者，與其他具有進步觀念的學者、官員、同行及民間組織有越多的

airiti

連結，該企業越有可能遵循對環境友善的自願性標準（van der Ven 2014）。換言之，行為者不單僅是依據後果的邏輯來行動，而也可能受適當的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所影響（March and Olsen 1996）。因此，即便是缺乏外部監督，或是在物質利益受損下，行為者仍然可能繼續遵循自願性標準。理性決策模型大多將行為者的偏好視作給定的，或抽象地假設行為者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在現實中，行為者的偏好往往是社會化的結果，何謂效益最大化以及如何追求效益最大化，常常是由社群的價值及規則所定義的，但俱樂部理論並無法用來分析行為者的偏好及行為是如何受社會化的影響。當俱樂部理論僅著重於後果的邏輯時，反而會導致研究者忽略了私權威透過價值觀念來影響行為者偏好的過程。

其次，俱樂部理論雖然承認企業的特質會影響企業的行為，但該理論並未重視市場結構可能影響企業的偏好及行為。例如，當一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高，市場由少數大型企業寡佔，這些寡佔企業便有可能透過建立自願性標準，以其來提高市場的進入門檻，從而確保其既有的寡佔優勢（Haufler 2018; Porter 1999）。又或者全球供應鏈在企業之間形成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也可能影響企業的行為。例如在全球供應鏈的大型零售商或中間商，或者是寡佔企業，常常擁有較大的議價權力去影響供應鏈中的產品供應商（MacDonald 2014）。當這些大型零售商、中間商或寡佔企業，帶頭遵循自願性標準時，會對其他產品供應商產生壓力，讓他們也得開始遵循自願性標準（González et al. 2008; Haufler 2018; Mayer and Gereffi 2010）。同樣的，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也可以透過全球供應鏈向開發中國家的企業施壓，要求其遵循自願性標準（Jeppesen and Hansen 2004）。此外，出口貿易也可能產生加州效應（California Effect），亦即開發中國家的產品供應商，為了能讓出口到已開發國家的產品，符合具有社會及環境意識的零售商、消費者及管制者的期待，而選擇採取較嚴格的自願性標準（Distelhorst and Locke 2018; Greenhill et al. 2009; Prakash and Potoski 2006a; Vogel 2005）。然而，若當貿易的出口市場為開發中國家時，產品供應商採取嚴格標準的誘因便會降低（Schleifer 2015; 2017）。

再者，俱樂部理論著重於企業之間的策略互動，但忽略了自願性標準的建

立，也涉及了企業、國家，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策略互動。自願性標準可能不單只是企業在理性決策下的集體行動，也可能是企業、國家，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政治協商後的產物。以森林管理委員會為例，它的成立雖然是來自於企業在面對社會運動壓力下的自發行動，但在成立過程中，許多非政府組織的代表都有參與，一些私人基金會、歐洲國家及美國的地方政府也在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草創時期提供資金援助（Bartley 2007）。而在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個案中，非政府組織、美國政府的勞工部、以及加州州政府，也都扮演了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角色，其不但支持建立私部門標準，也積極向企業施壓，要求企業進行自我管理（Bartley 2007）。簡言之，俱樂部理論雖然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自願性標準的形成機制，但它有可能會忽略其他的重要行為者，從而無法掌握故事的全貌。

最後，俱樂部理論預設了非國家行為者有足夠能力及資源來建立及參與自願性全球標準，也因此導致該理論並無法用來解釋為何自願性全球標準仍多集中於已開發國家（Conroy 2007; Pattberg 2005; 2006）。以森林管理委員會為例，其所認證的森林仍大多集中於歐洲及北美洲。近期研究已開始探索此問題，並指出發展中國家的非國家行為者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使其較不易參與自願性全球標準。首先，發展中國家的非國家行為者缺乏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因此難以建立自願性標準（Andonova and Sun 2019; Marx and Cuypers 2010）。再者，若發展中國家的商品並非出口至重視企業責任的已開發國家，企業也會缺乏誘因去參與自願性標準（Bartley 2010）。若商品出口市場為開發中國家，甚至可能出現標準降低的情形。

二、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類型變異

（一）供給需求理論

除了私權威的興起，私權威的類型變異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學者Green（2013）依據私權威的起源，區分出兩類型的私權威：第一類為授權型私權威（delegated private authority），另一類為創業型私權威（entrepreneurial private authority）。當國家或國際組織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國家（或國際組織）和非國家行為者之間形成委託-代理的關係（principle-ag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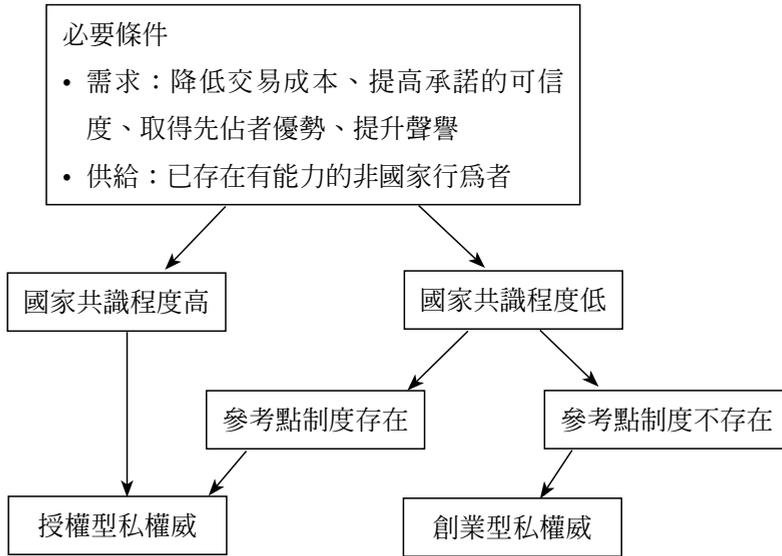
relationship)，這類型的私權威屬於授權型私權威。若私權威的權威並非來自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授權，該類型便屬於創業型私權威。對授權型私權威而言，被治者的同意通常會先在委託人之間形成，而後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來進行治理。但對創業型私權威來說，私權威必須設法取得被治者的認可，因此被治者的同意會較晚形成。

為何有時會出現授權型私權威，但在另一些時候會出現創業型私權威呢？Green（2013）試圖透過供給需求理論來回答上述問題，她的供給需求理論將私權威的形成過程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圖2）。首先，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家行為者出現對私權威的需求，希望能夠享受到私權威所帶來的效益。具體來說，私權威能夠帶來四類效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承諾的可信度、取得先佔者優勢，以及為參與者提升聲譽。由於私權威能夠產生這四類效益，因此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家行為者會產生對私權威的需求⁹。其次，在現實中必須已經存在有潛在能力能成為私權威的非國家行為者，這些非國家行為者需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制定標準。換言之，現實中必須已存在能夠供給上述四類效益的非國家行為者。除此之外，既有的國際組織必須無法提供上述四類效益，私權威才能夠出現。相較於非國家行為者，國際組織的治理結構及經費都受控於成員國家，較容易受國家控制。也因此，假若國際組織也能夠提供上述

⁹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人正確地指出，俱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的目的相仿。本文認為，俱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確實共享一些假設及問題意識，例如俱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都認為，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能為參與者帶來一些正面效益，如提升聲譽。此外，在解釋創業型私權威的形成過程時，供需理論和俱樂部理論皆假定非國家行為者為主要的行為者，其有專業能力及誘因去建立自願性標準。再者，兩個理論共同的問題意識都是如何解釋全球自願性標準的興起。然而，供需理論和俱樂部理論雖然在一些假設及問題意識上十分接近，但其理論解釋力的範圍（scope）仍有差異，供需理論比俱樂部理論更能解釋私權威的變異。本文認為，這兩種理論主要的差異在於如何解釋授權型私權威的形成過程。俱樂部理論主要著眼在非國家行為者，但並未處理國家的角色，也未處理國家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的過程。以Green所舉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為例，該機制源自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並不是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因此俱樂部理論並無法完整解釋CDM的興起過程，尤其無法解釋為何京都議定書的參與國最終決定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讓其成為監測及執行CDM的主要權威者。反之，供給需求理論指出，在一些條件下（可參考表3），國家會有誘因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助其成為授權型私權威。

四類效益，國家通常會更傾向授權給國際組織，而較不會選擇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

圖2 供給需求理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reen（2013）。

上述三條件構成私權威出現的必要條件，但要解釋私權威的類型變異，還需要第二個關鍵條件：國家之間偏好相似的程度，以及是否已存在可作為參考點的制度（focal institutions）。首先，當國家之間的偏好越相似的時候，國家越能夠產生共同的偏好，並將任務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執行。當委託人的目標及指令都一致清晰時，代理人的行為也會較受控制。但若國家之間的偏好差異過大，授權的工作便變得難以進行。當委託人自己沒有確定的偏好，代理人便容易無所適從，甚至出現陽奉陰違的行為。因此，當國家之間越能取得共識的時候，授權型私權威越容易產生，而當國家之間難以取得共識時，創業型私權威較容易形成。其次，當可作為參考點的制度時，國家的偏好較容易趨近，從而越容易產生授權型私權威。通常國際組織常能成為可作為參考點的制度，提供較中立可靠的資訊給國家，並作為協調者，幫助國家之間形成共識。因此，

即便國家的偏好在一開始差異很大，若存在可作為參考點的國際組織時，授權型私權威還是有可能產生。

學者Green（2013）主要以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GP）這兩個氣候治理的例子，來闡述其供給需求理論（表3）。CDM來自於京都議定書，其目的在創建一個國際市場，讓已開發國家可以透過資助開發中國家的減排計劃，來達成自身的減排目標。在京都議定書簽訂之前，私部門（如SGS集團）已發展出監測及核實碳補償（carbon offsets）的方法。為了快速推動CDM，參與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決定授權一些企業及非政府組織，讓其來負責監測及核實CDM，這些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從而成為授權型私權威。此外，京都議定書設立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成為此議題中夠強的參考點，成員國同意透過執行委員會來監督CDM的代理人，這能減緩國家對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踰越其權威的擔憂，從而有助於授權型私權威的形成。GGP則是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這兩個非政府組織所建立，GGP為企業提供了計算及報告溫室氣體排放的標準及工具。由於國家之間對於如何測量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缺乏共識，再加上能成為參考點的

表3 私權威類型變異的案例分析

代表案例	形成條件
清潔發展機制 （授權型私權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私部門具有獨立執行CDM的能力 • 參考點強：國家同意透過執行委員會來監督CDM的代理人 • 由於國際談判擴日費時，國家決定授權私部門，讓其能迅速執行CDM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創業型私權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家之間缺乏共識 • 參考點弱：UNFCCC秘書處缺乏資源及能力 • 私部門填補管制真空，制定出GGP標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reen（2013）。

UNFCCC秘書處缺乏資源及能力來推動此議題，這導致WRI及WBCSD得以填補管制上的真空，成為推出GGP的創業型私權威。

（二）供給需求理論的限制

儘管Green的供給需求理論試圖解釋私權威變異，但她的理論並未能涵蓋私權威的所有類型。首先，近年來學界開始重視協作（orchestration）作為一種治理類型。依據Abbott的定義，協作並不依賴強制性的控制，是一種運用誘導來進行非直接的治理（Abbott 2018）。協作包含了三種行為者：協作者（orchestrator）、中介者（intermediaries），以及目標對象（targets）。在協作的關係中，協作者與中介者之間不存在階層式關係，協作者並無法強制中介者執行其目標，協作者能做的，是尋找與自己目標相近的中介者，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治理目標對象。協作者通常透過說服、提供物質或觀念上的支持，以及聲譽上的誘因等軟性方式來讓中介者的行動與自己的目標吻合。Green的授權型私權威，仍將國家（或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的關係界定為委託-代理的關係，但國家（或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的關係也能夠以協作的方式來展現（Abbott and Snidal 2009; Hale and Roger 2014），Green的理論並無法解釋這類型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

此外，Green的供給需求理論並無法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在設計上的變異。在設計上，有的自願性標準較嚴格，有的較寬鬆。此外，有些自願性全球標準在建立之初並非未具有全球規模，而是先針對特定地方或區域。有些自願性標準的管制對象僅針對特定行業，有的則是跨行業。有的自願性標準包含了多樣的政策目標，有的則是設定單一目標。在演進成全球性標準時，各種自願性標準的演進速度也不一樣。例如，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花了32年才建立起全球標準，但森林管理委員會僅花6年便建立起全球標準（Auld 2014）。Auld（2014）認為自願性標準在建立之初時的政治機會及市場需求，都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制度設計。當政治體制較為開放，本地市場與全球市場的連結性也較高時，私權威較能在一開始便選擇建立起全球性的標準。若私權威在創始之時決定先建立地方性標準，標準的參與者為了維護既有地方性標準所帶來的利益，有可能會在日後抵制地方性標準升級成全球性標準，從而讓建立全球性標準的速度變慢。

三、自願性全球標準的成效

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一直是私權威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在經驗上，目前學界大致取得以下發現。首先，如果我們僅著眼於自願性標準是否能夠改變參與者的行為，目前的研究確實發現，自願性標準中的第三方認證，確實能夠讓參與認證的企業改變行為（Newsom et al. 2006）。然而，這樣的結果有可能受選取偏差（selection bias）影響，亦即只有那些調適成本較低的企業，才會願意選擇接受第三方認證（Auld et al. 2008; Gullison 2003; 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其次，若我們關注的是自願性標準能否改善成立目標中所界定的問題，目前的研究則是呈現不一致的結果。例如多數研究發現ISO 14001確實能夠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Melnik et al. 2003; Potoski and Prakash 2013）。多數研究也發現，針對永續農業的自願性標準有助於提升農民的收入，並使農民採取更有利於土壤保持的耕種方式，但亦有少數研究發現自願性標準並未提升農民收入，森林砍伐的情形也未改善（Blackman and Naranjo 2012; Marx and Cuypers 2010; Schleifer and Sun 2020; van der Ven et al. 2018）。整體而言，多數研究顯示，自願性全球標準確實能產生正面成效，但成效的大小會因不同的脈絡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況，甚至會出現負面效果，自願性全球標準並非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能解決問題的萬靈丹（DeFries et al. 2017）。

也正因為自願性標準的成效存在著變異，目前研究試圖找出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成效¹⁰。目前學界已提出下列可能因素：首先，依據俱樂部理論，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主要可能會受到標準的制度設計所影響。當自願性標準缺乏內部的監督及懲罰機制時，自願性標準的成員便會有誘因成為搭便車者，不願意付出成本改變自身行為，從而削弱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例如，研究者發現，化學業的Responsible Care在創立之初，由於缺乏監督及懲罰機

¹⁰ 自願性標準在不同的議題領域及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中，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及屬性。本文從既有文獻中歸納出的幾項因素，並不一定能解釋所有自願性標準在不同議題領域及時間點上的成效。本文在此節僅試圖歸納出既有研究的整體性輪廓，針對個別自願性標準的具體分析已超出本文能處理的範圍，另需專文處理。

制，因此成效不彰，該標準的參與者並沒有比非參與者製造較低的環境污染（Gamper-Rabindran and Finger 2013; King and Lenox 2000）。

其次，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也可能受全球供應鏈的結構影響。例如，當採取自願性標準的領導企業在供應鏈中有較大的權力時，領導企業越有可能影響其他供應商的行為，要求其他供應商遵循自願性標準，從而讓自願性標準的成效提升（Mayer and Gereffi 2010）。研究也發現，當供應鏈中的買家跟供應商之間能建立合作關係，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也會越好（Locke 2013）。當領導企業願意幫助供應商提升能力，改變供應商的管理模式，也有助於提升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例如Nike協助供應商建立精益管理與生產系統（lean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system），這套新系統讓供應商有更高遵循自願性標準的誘因，也將低供應商遵循標準的成本，從而增進了供應商對自願性標準的遵循程度（Distelhorst et al. 2016）。

再者，外在社會壓力的強弱，也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成效。許多研究都發現，當來自公民社會的行為者（如非政府組織及媒體）所製造的抵制壓力越強，企業為了維護品牌聲譽，便越可能遵循自願性標準（Fransen 2011a; Fransen and Burgoon 2012; Lenox and Eesley 2009; McDonnell and King 2013; Seidman 2007; Soule 2009）。非政府組織除了抵制企業之外，也能透過與企業合作的方式，幫助企業改進表現（Distelhorst et al. 2015）。研究也發現，當一個國家的公民關心自然環境，或新聞自由程度越高，企業的負面行為越容易被揭發，社會抗議也較易組織起來監督企業，企業因而更容易傾向遵循自願性標準，侵犯勞工權益事件的數量也會較少（El Ghoul et al. 2019; Toffel et al. 2015）。

此外，多個自願性全球標準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的成效。在許多行業，往往存在多個自願性全球標準彼此競爭。企業為了降低調整成本，可能會選擇較不嚴格的標準，使得行業出現向下競逐（race to the bottom），多樣化的標準也會讓消費者混淆，並讓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實踐呈現不一致甚至相互衝突的情形，最終傷害全球標準整體的公信力（Abbott and Snidal 2009; Bitzer et al. 2008; de Man and German 2017; Fransen 2011b; Glasbergen 2013; Pattberg 2005）。然而，亦有學者指出，自願性全球標準之

間的競爭，也有可能形成向上提升的效果。例如，在美國家具建材零售商 Home Depot 採用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自願性標準後，永續林業倡議（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也希望 Home Depot 能採用其標準，在公民團體的監督壓力下，永續林業倡議為此更新了原本的標準，讓其標準變得更加透明且嚴格（Overdevest 2010）。

最後，當自願性全球標準在各地實際執行時，往往會受到各國國內制度及政策的影響。例如當國家已有積極的勞工及環境法規，能對不遵守自願性標準的企業提出懲罰的威脅，則企業越會遵循自願性標準（Distelhorst et al. 2015; Locke et al. 2013; Vogel 2008）。跨國的量化研究也發現，當國家已有較保護勞工權益的法規，或批准越多國際勞工條約，這些制度會對企業形成更強的壓力，讓企業越可能遵循自願性的勞工標準，勞工權益受損的案件也會較少（Toffel et al. 2015）。然而，各國的國內制度及政策有的可以強化自願性標準，有的也可能弱化自願性標準。例如在印尼，國家與伐木業的關係非常緊密，政府透過補貼支持大型的伐木企業，這些大企業因而缺乏誘因接受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認證；再加上，印尼政府對土地所有權的界定不清，甚至偏向保護企業的利益，這也讓森林管理委員會的標準難以適用於當地（Bartley 2010）。針對棕櫚油的生產，印尼政府則是仿效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標準，但該國家標準卻比自願性全球標準更為寬鬆，對資訊透明及課責性的要求較低，也使得自願性全球標準在當地不易施行（Hospes 2014; Wijaya and Glasbergen 2016）。

整體而言，目前學界對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限制。首先，多數研究的發現仍然受到選取偏差的影響，因此難以判斷自願性標準是否為造成特定結果改變的直接原因。雖然一些研究開始使用進階的統計方法如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或準實驗方法來克服選取偏差的問題，但這些方法各自仍有其限制¹¹。其次，資料的品質及取得管道也是一大限制。例如，在測量環境品質時，常會出現各國標準不一，或者資料錯誤及遺失等狀況（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此外，在評估成效的時候，目前的

¹¹ 統計方法較無法處理複雜的因果機制，而實驗方法則有外部效度的問題。

研究大多著重於參與者的行為變化，或者是客觀環境指標，但這樣的研究設計主要是在比較採取自願性全球標準與否的效果，但並無法幫助我們了解自願性全球標準是否比其他的治理模式（如傳統由政府管制）更為有效。最後，目前研究對成效的定義仍較為狹隘，忽略了自願性標準可能產生其他更廣泛的效果，例如自願性標準可能產生非意圖後果，或是可能產生擴散效果或反饋效果，並對社會產生緩慢但深遠的影響（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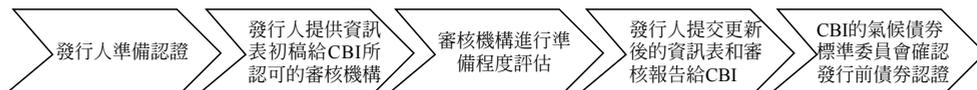
四、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為例

筆者以下將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後簡稱CBI）作為關鍵個案，更具體地闡述本文對既有理論及分析途徑的反省。CBI創立於2009年，屬於國際非營利組織，其主要透過建立標準、綠色債券資料庫及發佈研究報告等方式，以促進氣候債券及綠色債券的全球發展¹²。為了能夠幫助投資者更有效地辨識氣候債券的真偽，防止債券發行人透過綠色標籤來為債券「洗綠」（greenwashing），CBI於2010年建立了氣候債券標準（Climate Bonds Standard，後簡稱CBS），綠債發行人可以自願選擇是否要付費參與CBI的認證流程（圖3），若該債券確實在發行前及發行後皆符合了CBS的要求，則可以獲得CBI提供的認證證明。自CBS第1版發佈後，CBI仍持續地更新該標準，並在2019年實施第3版的CBS。最新版的CBS規定了氣候債券的募集資金用途、評估流程、資金管理方式，以及資訊揭露方式，並將符合氣候債券標準的項目區分成8大類，在每一大類下，又再細分行業（表4），並分別制定出專屬於該行業的合格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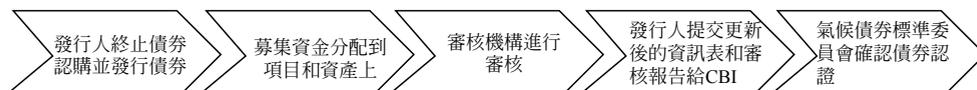
¹² 綠色債券是將募集資金專用於綠色計畫的債務融資工具，目前的綠色債券大多將資金投向能源、低碳建築及運輸。而氣候債券則是將募集資金用途，更限縮在對氣候減緩與調適有助益的項目上。其中，CBI標榜其氣候債券標準是以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而設計的。

圖3 氣候債券認證流程

1. 發行前認證流程：



2. 發行後認證流程：



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2021）。

由上可知，CBI屬於非國家行為者，又建立了自願性全球標準CBS，因此可被視作本文界定的全球性私權威。從權威類型來看，CBI可被視作專業型權威（expert authority）。CBI之所以能具有權威，主要在於其團隊具有足夠專業的科學、金融及產業相關知識，能夠建立以行業為基礎的技術標準，並有能力評估審查債券是否符合其標準。由於CBI的標準具有足夠的專業性，從而讓全球的市場參與者自願地接受，成為具有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

從理論來看，CBI的案例可以印證供給需求理論及俱樂部理論的主要論點，但也可以突顯其不足之處。首先，從形成過程來看，CBI接近供給需求理論中所說的創業型私權威（entrepreneurial private authority）。氣候債券及綠色債券屬於新興的金融市場，國家之間尚未對如何進行綠債市場的管制產生共識。雖然聯合國環境署於2014年建立了UNEP永續性金融體系探詢（UNEP Inquiry），2016年的G20也決定進一步成立綠色金融研究小組（G20 Green Finance Study Group），但這些組織及制度的人員及資源都較有限，屬於較弱的參照點。在這些條件下，如供給需求理論所預期的，創業型私權威得以形成。其次，CBI所建立的CBS也符合俱樂部理論所闡述的邏輯。CBS可被視作俱樂部財，有助於協助綠債發行人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CBS包含定期更新的認證及資訊揭露機制，從而讓投資者能得到較可靠的綠債資訊，也能夠確保CBS的聲譽不被搭便車的參與者破壞，這才能讓更多綠債發行人願意為聲譽而自願參與CBI的認證。

表4 氣候債券分類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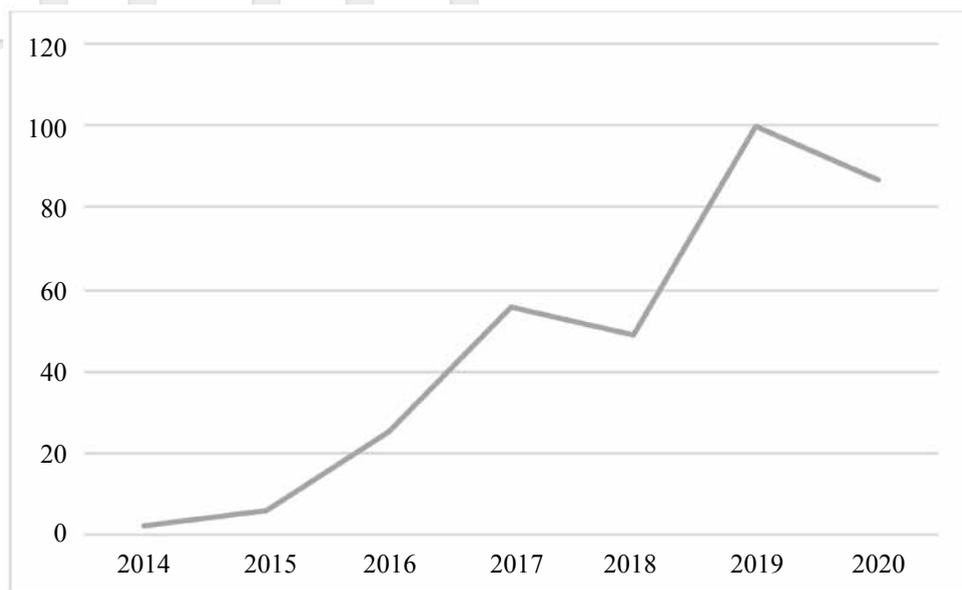
能源	運輸	氣候變遷調適	低碳建築	通訊技術	廢棄物和污染控制	自然資產	工業及能源密集產業
太陽能	低碳運輸 (陸地)	水	居民建築	電力管理	回收設施	農業、森林 和土地利用	製造業
地熱能	車輛	能源	商業建築	遠程會議	回收產品和 循環經濟	的減緩	能源效率過程
水電	大眾運輸	工業及廢棄物	建築升級	資源效率	廢棄物轉換 能源	農業、森林 和土地利用	能源效率產品
生物質能	公車運輸	運輸	改善建築碳 排放效率的 產品		碳封存	的調適	零售和批發
波浪和潮汐 能	水運	通訊技術				農業產品	數據中心
能源分配與 管理	替代燃料 基礎設施	建築					捕捉工業過程 中的排放
專用電網		食物供給					能源效率設備
		海岸					熱電聯產

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2021)。

然而，供給需求理論及俱樂部理論雖然可以解釋CBS的權威類型及運作邏輯，但較忽略CBI與其他組織之間的策略互動及協作關係，從而忽視這些互動關係對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影響。CBI其實置身於一個複雜的全球治理網絡之中，其參與者、合作夥伴及經費來自於銀行、投資機構、評級機構、交易所、政府部門、國際組織，或國家的開發銀行。既有的私權威理論並無法協助我們分析這些網絡是如何形成，是否及如何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運作。從CBI的案例來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設計確實會受到組織之間的互動而產生演化。例如，當歐盟開始制定歐洲綠色債券標準（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時，CBI其實也參與其中，為歐盟的綠債標準提供了政策建議。CBI甚至回頭更新自己的CBS，加強對資訊揭露的要求，以求自己的標準能夠與歐盟的新標準趨向一致。換言之，自願性標準在建立之後仍會受到組織之間策略互動的影響，而這部分仍是目前主要理論尚未細緻處理的部分，值得後續的理論建構及經驗研究。

最後，私權威研究會關注CBI所建立的CBS是否具有成效，目前確實有跡象顯示CBS能產生一些正面成效，但針對此問題的研究仍然相當不足。首先，若單從接受認證的債券發行人數量來看，在2014年至2019年期間，參與CBI認證的綠債發行人數量呈現成長趨勢（圖4），截至2021年1月，全球已有330隻債務工具獲得CBI的認證，確實有越來越多綠色債券發行人自願付費接受CBI的認證。其次，有學者運用統計的配對方法，發現有經過第三方認證的綠色債券，能讓公司股價上升，也能降低該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Flammer 2020）。最後，許多國家的政府、區域組織（如東協）及歐盟在制定自己的綠色債券標準時，幾乎都會明確表示自己參考CBS的分類方法，由此可見CBS確實對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而，正如本文上一節所述，目前對CBS成效的定義仍較為狹隘，忽略了CBS可能產生其他更廣泛的、甚至是非意圖的後果。例如，已有論者指出綠色債券在一些條件下可能會惡化社會不平等（Bigger and Millington 2019; Christophers 2018），而目前我們仍缺乏足夠的研究來瞭解，CBI認證的氣候債券是否也會產生這類負面效果。

圖4 已認證氣候債券數量 (2014~2020)



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2021)。

肆、結論

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念可成為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基礎。首先，私權威的概念有助於我們跳脫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傳統觀念，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的途徑。研究者可以轉而觀察分析在全球各層次，權威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運作。其次，私權威的概念強調了治理者與被治者間的互動關係，凸顯了行為者的重要性，這有助於研究者去建立行為者導向的途徑，以此研究結構導向途徑所無法解釋的變異。私權威的概念可作為全球治理研究的基石，研究者除了可以著重於私權威本身的行為外，也可以進一步去分析私權威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從而去理解更複雜的全球治理模式。再以治理三角為例（圖1），私權威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深入分析區塊2、3與6的治理模式，結合過去政治學對區塊1的研究成果，未來研究可以藉此對區塊4、5與7進行更細緻的經驗研究。簡言之，私權威的觀點並不是要主張國家的消退。相反地，私權威觀點的目的

在於開啓對多元權威者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議程。私權威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去細緻地分析多類權威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複雜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全球治理的成效。

以私權威的概念為基礎，本文也回顧了目前私權威研究中的三項研究問題：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式為何出現變異？在哪些條件下，自願性全球標準能產生較好的成效？首先，本文分別討論了俱樂部理論及供給需求理論，這兩個理論都能幫助我們從行為者的偏好及策略互動，來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及變異。然而，這兩個理論也有各有其限制。未來研究者除了關注行為者的偏好及策略互動之外，也應考量價值觀念、全球供應鏈、公私互動關係，以及南北關係等因素的作用。其次，本文從現有研究中歸納出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幾項因素，並指出目前的研究限制。未來的研究除了需要設法改善資料搜集的程序及體制，以此提升資料品質，也可考慮使用混合方法，例如在透過量化方法來克服選取偏差的問題外，也可以使用質化的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及比較方法來闡述複雜的因果機制。更重要的是，未來研究可採取更多元的指標來測量自願性標準的成效。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在本文著重的三項研究議題之外，私權威研究還存在其他重要議題，諸如私權威的變遷、私權威之間的競爭、私權威的課責性，以及私權威與公部門的互動等，這些研究議題也都值得國內學界進一步去探究。隨著學界對上述議題研究的累積，未來我們將有機會能更準確地評估私權威對全球治理所帶來的整體影響為何，以及全球治理是否因此出現量變及質變。

（收件：109年3月20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e Perspective of Private Authority

Jiun-Da Li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and the current studie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can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wo ways. First,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state-center approach. Secon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ctor-oriented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Additionally, by investigating a case of 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ree crucial research topic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e emergence, the variation in the form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e conclusion then outlin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Private Authority,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Non-state Actor

airiti
參考文獻

- 宋學文，2003，〈非政府組織（NGOs）在全球治理中之機會與限制：一個政治學的觀點〉，《中國行政評論》，13（1）：127-158。Soong, Hseik-Wen. 2003. “ei zheng fu zu zhi (NGOs)zai quan qiu zhi li zhong zhi ji hui yu xian zhi: yi ge zheng zhi xue de guan dian” [The Opportunity and Limit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Global Governance: A 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3 (1): 127-158.
- 辛翠玲，2019，〈2008年之後全球金融治理機制的重整：規範、制度與結構〉，《問題與研究》，58（4）：1-28。Shin, Chueiling. 2019. “2008nian zhi hou quan qiu jin rong zhi li ji zhi de zhong zheng : gui fan 、zhi du yu jie gou” [Reform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Regime Since 2008: Regulation,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Wenti Yu Yanjiu*, 58 (4): 1-28.
- 郁瑞麟、周繼祥，2015，〈國際關係研究中全球治理的概念及理論之跨領域探討：以本體論與知識論為核心〉，《問題與研究》，54（1）：65-94。Yu, Ruei-Lin, and Jih-Shine Chou. 2015. “guo ji guan xi yan jiu zhong quan qiu zhi li de gai nian ji li lun zhi kua ling yu tan tao: yi ben ti lun yu zhi shi lun wei he xi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s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SIR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cus on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Wenti Yu Yanjiu*, 54 (1): 65-94.
- 袁鶴齡，2003，〈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論其策略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4：25-45。Yuan, Hao-Lin. 2003. “quan qiu zhi li yu guo ji he zuo : lun qi ce lue yu kun j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Restrictions].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4: 25-45.
- 袁鶴齡、沈燦宏，2012，〈從全球治理的權力類型探究兩岸合作的可能模式〉，《中國大陸研究》，55(2)：75-103。Yuan, Hao-Lin, and Tsan-Hung Shen. 2012. “cong quan qiu zhi li de quan li lei xing tan jiu liang an he zuo de ke neng mo shi” [Types of Possible Cross-Straits Cooperation: An Approach of Global Governance Power Typolo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5(2): 75-103.

- 張亞中，2001，〈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 (4): 1-24。Chang, Ya-Chung. 2001. “quan qiu zhi li : zhu ti yu quan li de jie xi” [Global Governance: The Analysis of Subject and Power]. *Wenti Yu Yanjiu*, 40 (4): 1-24.
- 張雅君，2008，〈中國非洲戰略爭議探析：全球治理VS.南南合作〉，《遠景基金會季刊》，9 (4): 1-51。Chang, Ya-Chun. 2008. “zhong guo fei zhou zhan lue zheng yi tan xi : quan qiu zhi li VS. nan nan he zuo” [Analysis of Controversies over China’s Strategy in Africa: Global Governance v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ospect Quarterly*, 9 (4): 1-51.
- 曹俊漢，2013，〈全球治理與氣候變遷：評估哥本哈根會議 (COP15) 決策機制的衝擊與對策〉，《歐美研究》，43 (1): 89-148。Tsao, Jiun-Han. 2013. “quan qiu zhi li yu qi hou bian qian: ping gu ge ben ha gen hui yi (COP15) jue ce ji zhi de chong ji yu dui ce” [Global Governance and Climate Change-An Assessment of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COP15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43 (1): 89-148.
- 彭慧鸞，2004，〈數位時代的國家安全與全球治理〉，《問題與研究》，43 (6): 29-52。Poong, Hwei-Luan. 2004. “shu wei shi dai de guo jia an quan yu quan qiu zhi li” [Digital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Wenti Yu Yanjiu*, 43 (6): 29-52.
- 楊惟任，2015，〈主權國家於全球氣候治理的角色分析〉，《全球政治評論》，49: 83-106。Yang, William. 2015. “zhu quan guo jia yu quan qiu qi hou zhi li de jiao se fen xi” [Role of Sovereign Stat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49: 83-106.
- 顏良恭、謝儲鍵，2015，〈國際非政府組織：森林監管委員會在中國之發展〉，《中國大陸研究》，58 (1): 29-64。Yen, Liang-Kung, and Chu-Chien Hsieh. 2015. “guo ji fei zheng fu zu zhi: sen lin jian guan wei yuan hui zai zhong guo zhi fa zh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 (1): 29-64.

- Abbott, K. 2018. "Orchestration: Strategic Ordering in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n A. Jordan, D. Huitema, H. van Asselt, and J. Forster, eds.,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pp. 188-20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bbott, Kenneth, and D. Snidal. 2009.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through Transmittal New Governance: Overcoming the Orchestration Defici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2: 501-578.
- Andonova, L. B., and Y. Sun. 2019. "Private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rivers of Voluntary Carbon Offset Program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 (1): 99-122.
- Auld, G. 2014. *Constructing Private Governance: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Forest, Coffee, and Fisheries Certification*.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uld, G., L. H. Gulbrandsen, and C. L. McDermott. 2008. "Certification Schemes and the Impacts on Forests and Forestry."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33 (1): 187-211.
- Avant, D. D., M. Finnemore, and S. K. Sell. 2010. *Who Governs the Glob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M., and M. Finnemore. 2004.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rtley, T. 2007. "Institutional Emergenc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 (2): 297-351.
- Bartley, T. 2010. "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in Practice: The Limits of Forest and Labor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in Indonesia." *Business and Politics*, 12 (3): 1-34.
- Bernstein, S., and B. Cashore. 2007. "Can Non-state Global Governance Be Legitimat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Regulation & Governance*, 1 (4): 347-371.
- Bigger, P., and N. Millington. 2020. "Getting Soaked? Climate Crisis, Adaptation Finance, and Racialized Auster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3(3): 601-623.

- Bitzer, V., M. Francken, and P. Glasbergen. 2008. "Intersectoral Partnerships for a Sustainable Coffee Chain: Really Addressing Sustainability or Just Picking (Coffee) Cherr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8 (2): 271-284.
- Blackman, A., and M. A. Naranjo. 2012. "Does Eco-certification Hav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rganic Coffee in Costa Rica." *Ecological Economics*, 83: 58-66.
- Braithwaite, J., and P. Drahos. 2000. *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üthe, T. 2010. "Privat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P)Review." *Business & Politics*, 12 (3): 1-38.
- Cashore, B., G. Auld, S. Bernstein, and C. McDermott. 2007. "Can Non-state Governance 'Ratchet Up' Glob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Lessons from the Forest Sector."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6 (2): 158-172.
- Cerny, P. G.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4): 595-625.
- Christophers, B. 2018. "Risk Capital: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Entanglements of Financi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in Washington, DC."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1(1-2), 144-164.
-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2021. "Certification." <https://www.climatebonds.net/certification/get-certified> (May 12, 2021).
-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roy, M. E. 2007. *Branded!: How the 'Certification Revolution' Is Transforming Global Corporation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Cutler, A. C., V. Haufler, and T. Porter, 1999. "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 C. Cutler, V. Haufler, and T. Porter, eds., *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 257-28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utler, A. C. 1997. "Artifice, Ideology and Paradox: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2): 261-285.
- Dauvergne, P. 2017. "Is the Power of Brand-Focused Activism Rising? The Case of Tropical Deforest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6 (2): 135-155.
- de Man, R., and L. German, 2017. "Certify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Biofuels: Promise and Reality." *Energy Policy*, 109: 871-883.
- DeFries, R. S., J. Fanzo, P. Mondal, R. Remans, and S. A. Wood. 2017. "Is Voluntary Certification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Goals for Small-scale Produce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2 (3): 033001.
- Dingwerth, K., and P. Pattberg. 2006. "Global Governance as 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2 (2): 185-203.
- Distelhorst, G., J. Hainmueller, and R. M. Locke. 2016. "Does Lean Improve Labor Standards? Management and Social Performance in the Nik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ience*, 63 (3): 707-728.
- Distelhorst, G., and R. M. Locke. 2018. "Does Compliance Pay? Social Standards and Firm-Level Trad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 (3): 695-711.
- Distelhorst, G., R. M. Locke, T. Pal, and H. Samel. 2015. "Production Goes Global, Compliance Stays Local: Privat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Regulation & Governance*, 9 (3): 224-242.
- Djelic, M.-L., and K. Sahlin-Andersson. 2006.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en, L., and E. H. Potter. 1993. *Multinational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El Ghoul, S., O. Guedhami, R. Nash, and A. Patel. 2019. "New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4 (4): 1051-1079.
- Finkelstein, L. S. 1995.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 (3): 367-372.
- Finnemore, M. 2014.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on What We Kno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1): 221-224.
- Flammer, C. 2020. "Green Bonds: Effectiven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1): 95-128.
- Fransen, L. 2011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Labor Standards: Firms and Activists in the Making of Private Regul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Fransen, L. 2011b. "Why Do Privat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Not Converge? A Political-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Regulation." *Governance*, 24 (2): 359-387.
- Fransen, L., and B. Burgoon. 2012. "A Market for Worker Rights: Explaining Business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bour Regul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 (2): 236-266.
- Friedrichs, J. 2009. "Global Governance as Liberal Hegemony." In J. Whitman,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Global Governance*, pp. 105-122.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Gamper-Rabindran, S., and S. R. Finger. 2013. "Does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Reduce Pollution? Responsible Care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43 (1): 1-30.
- Glasbergen, P. 2013. "Legitimation of Certifying Partnerships in the Global Market Plac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3 (6): 354-367.
- González, P., J. Sarkis, and B. Adenso-Díaz. 2008.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orporate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8 (11): 1021-1041.

Green, J. F. 2013. *Rethinking Private Authority: Agents and Entrepreneur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enhill, B., L. Mosley, and A. Prakash. 2009. Trade-based Diffusion of Labor Rights: A Panel Study, 1986-200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4): 669-690.

Gullison, R. E. 2003. “Does Forest Certification Conserve Biodiversity?” *Oryx*, 37 (2): 153-165.

Hale, T., and C. Roger. 2014. “Orchest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9 (1): 59-82.

Hall, R. B., and T. J. Biersteker. 2002.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Autho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R. B. Hall and T. J. Biersteker, eds.,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pp. 3-22.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ufler, V. 2018. “Produc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Factory: Markets, Politics, and Regulation.” *Global Policy*, 9 (1): 114-120.

Hewson, M., and T. J. Sinclair. 1999.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In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pp. 3-19. Albany, NY: Suny Press.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fferberth, M. 2015. “Mapping the Meanings of Global Governance: A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of a Floating Signifier.” *Millennium*, 43 (2): 598-617.

Hospes, O. 2014. “Marking the Success or End of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The Rise of 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in Indonesia and Brazil for Palm Oil and Soy.”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31 (3): 425-437.

Humphreys, D. 1996. *Forest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UK: Earthscan.

Hurd, I. 1999.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2): 379-408.

Jeppesen, S., and M. W. Hansen. 2004.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Through Linkages t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 (4): 261-274.

Kahler, M., and D. A. Lake. 2003.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M. Kahler and D. A. Lak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 Economy: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ransition*, pp. 1-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g, A. A., and M. J. Lenox. 2000.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without Sanctions: The Chemical Industry's Responsible Care Program."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4): 698-716.

Lake, D. A. 200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ke, D. A. 2010. "Rightful Rules: Authority, O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 (3): 587-613.

Lenox, M. J., and C. E. Eesley. 2009. "Private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the Selection and Response of Firm Targ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8 (1): 45-73.

Locke, R. M. 2013. *The Promise and Limits of Private Power: Promoting Labor Standards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ke, R. M., B. A. Rissing, and T. Pal. 2013.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Private Codes, State Regula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Labour Standard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1 (3): 519-552.

MacDonald, K. 2014. *The Politics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Hoboken, NJ: Wiley.

March, J. G., and J. P. Olsen. 1996.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9 (3): 247-264.

- Marx, A. 2008. "Limits to Non-state Market Regulation: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 Footwear Industry and 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2 (2): 253-273.
- Marx, A., and D. Cuypers. 2010. "Forest Certification as a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ol: What Is the Macro-effectiveness of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Regulation & Governance*, 4 (4): 408-434.
- Mayer, F., and G. Gereffi. 2010.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Private Governance." *Business and Politics*, 12 (3): 1-25.
- McDonnell, Mary-Hunter, and B. King. 2013. "Keeping up Appearances: Reputational Threat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fter Social Movement Boycot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8 (3): 387-419.
- Melnyk, S. A., R. P. Sroufe, and R. Calantone. 2003.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on Corporat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1 (3): 329-351.
- Murphy, C. 199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185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rphy, C. N. 2000. "Global Governance: Poorly Done and Poor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 Affairs*, 76 (4): 789-803.
- Newsom, D., V. Bahn, and B. Cashore. 2006. "Does Forest Certification Matter? An Analysis of Operation-level Changes Required During the Smartwood Certification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9 (3): 197-208.
- Overdevest, C. 2010. "Comparing Forest Certification Schemes: The Case of Ratcheting Standards in the Forest Sector." *Socio-Economic Review*, 8 (1): 47-76.
- Overbeek, H. W. 2005. "Class, Hegemony and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In A. D. Ba and M. J. Hoffmann, ed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 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 pp. 39-56. London, UK;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attberg, P. 2006. "Private Governance and the South: Lessons from Global Forest Polit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 (4): 579-593.
- Pattberg, P. H. 2005.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Risk and Potential of Private Forest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14 (3): 356-374.
- Porter, T. 1999. "Hegemony and the Privat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 A. C. Cutler, V. Haufler, and T. Porter, eds., *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 257-28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otoski, M., and A. Prakash. 2009. *Voluntary Programs: A Club The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otoski, M., and A. Prakash. 2013. "Do Voluntary Programs Reduce Pollution? Examining ISO 14001's Effectiveness across Countri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1 (2): 273-294.
- Prakash, A., and M. Potoski. 2006a. "Racing to the Bottom? Trad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SO 14001."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2): 350-364.
- Prakash, A., and M. Potoski. 2006b. *The Voluntary Environmentalists: Green Clubs, ISO 14001, and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au, J. N. 1995.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1 (1): 13-43.
- Rosenau, J. N.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leifer, P. 2015. "Private Governance Undermined: India and 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6 (1): 38-58.
- Schleifer, P. 2017. "Private Regul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Change: The Driver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Brazil." *Governance*, 30 (4): 687-703.
- Schleifer, P., and Y. Sun. 2020. "Reviewing the Impact of Sustainability Certification

- on Food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Food Security*, 24: 100337.
- Seidman, G. W. 2007. *Beyond the Boycott: Labor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oule, S. A. 2009. *Conten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pford, J. M., S. Strange, J. S. Henley, and J. S. Henley. 1991.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ffel, M. W., J. L. Short, and M. Ouellet. 2015. “Codes in Context: How States,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Shape Adherence to Global Labor Standards.” *Regulation & Governance*, 9 (3): 205-223.
- van der Ven, H. 2014. “Socializing the C-suite: Why Some Big-box Retailers Are ‘Greener’ Than Others.” *Business & Politics*, 16 (1): 31-63.
- van der Ven, H., and B. Cashore. 2018. “Forest Certification: The Challenge of Measuring Impacts.”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32: 104-111.
- van der Ven, H., C. Rothacker, and B. Cashore. 2018. “Do Eco-labels Prevent Deforestation? Lessons from Non-state Market Driven Governance in the Soy, Palm Oil, and Cocoa Sector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2: 141-151.
- Vogel, D. 200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D. 2008. “Private 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 *Annu. Rev. Polit. Sci.*, 11: 261-282.
- Vogel, D. 2010. “The Private Regulation of Global Corporate Conduct: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Business & Society*, 49 (1): 68-87.
-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MA: McGraw-Hill.
- Weiss, T. G. 2000.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 Conceptual and Actual Challeng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1 (5): 795-814.
- Weiss, T. G., and R. Wilkinson. 2014.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uthority, Power,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1): 207-215.
- Wijaya, A., and P. Glasbergen. 2016. “Toward a New Scenario in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Certification? The Response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Government to Private Certifi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5 (2): 219-246.
- Yates, J., and C. N. Murphy. 2019. *Engineering Rules: Global Standard Setting Since 188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Zürn, M. 2018.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